

纽约骤暖,花忽然开了,出门一霎,像步入香格里拉。这时手机乍响,竟是鼎公,作家王鼎均。鼎公说,九兄,出来吃个午饭如何?我羞怯难当,边答应边惶惶恐道,鼎公折煞我,怎敢在您面前称兄?鼎公一笑,你看,想占你们年轻人点便宜都不行,太吝啬了吧?鼎公年过八旬,开朗幽默文笔挺,思路十分敏捷,不说笑不开口。我知道老先生今天高兴。

纽约的法拉盛有家叫“聚丰园”的小馆,江浙口味,物美价廉。我们约好在此碰头。几个月不见,鼎公还是神情爽朗谈笑风生。其他几位相约而来的朋友,散文家邓泰和、传记作家梁安仁,及若干新面孔,大家喜成一团,加上餐馆老板娘的热情招呼,只觉心房像那朵被鄙视的郁金香,耐不住撩拨开放了。

葱烤鲫鱼,清炒虾仁,小辣椒牛肉丝,丝瓜面筋,还有沙锅豆腐,这个组合堪称经典,无论色香味还是营养,面面俱到,天衣无缝。然后就开聊,聊当下,聊从前,谈读书,谈写作,纷纷扬扬无拘无束。梁先生说起他当年十四五岁,只身赴远寻找因内战失散的父亲,语气尚带坝上草原的燥热。泰和兄谈起几十年前在上海出版连环画册,目光仍涌动着青春激情。我话不多,与他们比我的阅历尚浅,但我喜欢听,听他们谈往事,觉得他们比我还年轻,我相信心灵只有生死不分老幼,难怪鼎公要跟我称兄道弟,心灵分什么辈分。

大多数现代人喜欢出游,一有假期马上安排上山、下海或是索性出国旅游。

经过无数次的游历,开始疲倦于提着行李箱,不停地上下火车,在不同的车站,走进嚣闹的市区,极目寻找当晚住宿的酒店名称,然后睡在不熟悉的床上。更何况,每一次清晨醒来,周围不一定有浮动的花香和清脆的鸟鸣。更多时候,人在旅途上,并非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和温暖。

《“黄包车”拉到今天》一文发表后,许多读者惦记着面黄肌瘦的杰里,那个与中国大孩子合伙做黄包车生意的犹太男孩。离开上海后他去了哪里?天然的生意头脑有没有引领他步入商界?他又是怎样回上海寻根的呢?

2006年1月15日的《洛杉矶时报》上有篇文章《一个犹太人的回乡之旅》,“引言”是这样的:“在数十载努力忘却自己二战期间作为难民的艰苦童年后,一位南加州人终于回到了中国,去拥抱那些救过他性命的人们。”往下读,主人公正是杰里·摩西!他的身份是“南加州退休商人”。

果然经商了,没有浪费遗传基因啊!杰里的父亲是一家犹太人连锁超市的布料采购商,杰里和姐姐、弟弟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直到1938年11月那个臭名昭著的夜晚,犹太人的家、店铺和教堂被毁于一旦,他父亲被关进集中营。

靠着母亲的奔走、营救,父亲才获释、逃离德国,到了上海。两年后,母亲又带着孩子去见盖世太保指挥官,求他给出境许可证盖章。“让我们去上海,或开枪杀了我们!”瘦小的母亲口气坚毅。指挥官赞叹:“你是一个

提起当今文坛,大家普遍对浮躁炒作之风深感忧虑。风气是传染的,有挑头的有跟风的,久而久之形成今天前赴后继的局面。文人不耐寂寞,就像做豆沙等不及那张过滤的网,泥沙俱下,难成精品,你看,想占你们年轻人点便宜都不行,太吝啬了吧?鼎公年过八旬,开朗幽默文笔挺,思路十分敏捷,不说笑不开口。我知道老先生今天高兴。

耐住寂寞一百年

(美) 陈九

终修不出文字的个人性风采。鼎公说,写作是修行,心不静就看不清,头脑浑浊,文字必不洗脱。一个作家的分量须让历史检验,没有一百年是看不出价值的,既然喜欢写作,又何必把名誉金钱看得过重,高兴就写,不高兴不写,这才是文学本意。一百年?一百年。鼎公说话带山东口音,百年的百字像伯字发音,有爆破音的味道。

说来也是,海外作家不靠写作谋生,按行内标准恐怕算业余的。他们远离母语文化,虽缺少借鉴,但环境单纯,没有光环罩顶和吹喇叭抬轿子的氛围,出不出名意思不大。参加侨社活动,如果主持人宣布你是作家,全世界人

民都笑了,连自己都不好意思。生活的乐趣莫过于作品见报,再有便像今天,同仁相聚吃小馆子,相互安慰鼓励,对写作没足够的热情就很难坚持下去。比如我自己,就是玩票,没什么伟大抱负,写作让我欢悦尽兴,酣畅淋漓,不过如此。再说诸事皆有惯性,惯性是生活的动力,写来写作习惯成自然,很难停下来。好像唱歌,纽约华人社区有不少歌唱爱好者,医生、商人、律师,他们不会因想当多明戈、帕瓦罗蒂才唱歌的,但是每周聚会,连吃带唱,俨然一

心里的天堂

大耳

用尽一生的时光,寻找自己内心深处的天堂。”然而,要是把清闲的假日,在异地的路途上奔波赶路,换成静静坐下来,默默用心思考,或阅读一本书,也许会发现,内心深处的天堂,不在远方、不在异地、不在他乡,就在自己的心里。

现在流行错别字啦?老母亲问我。起因是这天她在一家小店门口,见小黑板上写着“今几旦木到”五个字,因看不懂,问低头玩手机的店主是啥意思?小伙子说,就是今天鸡蛋没到。妈说,看你样子也是识字有文化的,怎么尽写错别字,五个字错了一大半?小伙子笑说,奶奶你不懂啦,这是网络语,很流行的,不信问问你子孙女,他们都懂。妈叹了口气,对我说,还记得吗?当初你两个弟弟为几个错别字,闹来闹去的。

“文革”开始,两个弟弟刚上小学,那时轻视文化,孩子们糊里糊涂读小学,马马虎虎进中学。小学六年级时,小弟班级里要外出学工农,他的要好同学小杨,派到郊区学农,小弟则安排在市区学工工。两个朋友分开了,就相互通信往来。某日,家里收到小杨同学寄来一封信,小弟拆开后,大家凑上去看。看到其中一句“昨天总算



孔雀图 (中国画) 万芾

种生活方式,写作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仅此而已。

鼎公说的一百年,其实很有寓意。人海茫茫几人能活一百岁,活到一百岁又如何?一百指的是,对写作者来说,这辈子最好别想出名的事,想也白想,

人,到底为何马不停蹄地旅游呢?把应该休闲的时间,全花在旅途中的漂泊,究竟是为了什么?一个作家的答案:“人,

到后来,他成了这家上海人的座上宾,在饭桌上熟练地用筷子撇藕片,嘴里嚼着糯米,情不自禁又说起从前——“当我在虹口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饿……中国人给我们食物,实际上他们的食物比我们更少……”

“我有德国的渊源、犹太的命运以及一颗中国的。”杰里说。一个犹太人,把给予他童年的异国他乡当作故土来追忆了。这就是所谓乡愁吧。

杰里·摩西的乡愁

潘真

……他停在马路中间,提高了声音以示强调:“但现在我的生活已经到了这个节点,你说,为什么不回来呢?而且坐飞机的时间也没那么长。”

……街上往来的都是年轻人,但摩西的注意力被一群喜欢在人行道上漫步的老人吸引过去。“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在我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住在这里。”他这样说,并走过去和他们握手问好。……他感谢的目标是在他最脆弱时期接受他、拥抱他的那种文化,和用自己的方式去实践这种文化

吃到一块寒内”,大家愣了片刻,才知道这个“寒内”就是咸肉,“寒”“咸”两字沪语发音差不多,“肉”字里面少了个“人”,就变成了“内”,于是家里笑声四起。比小弟大一岁的大弟,是个顽皮家伙,从此家里饭桌上,“寒内”两字他经常当山歌唱。比如,有时会问妈,今天怎么都吃素,一块寒内也没有?妈则回答:寒内也要凭票供应的。

小杨学农结束来我家玩,大弟一见就喊:哟,寒内来啦!后来小杨知道“寒内”的典故后很是羞愧,也不常来我家了。这让小弟脸上挂不住觉得对不起朋友,从此对大弟一张臭嘴恨得痒痒的,直到后来大弟犯了五十步笑百步的错,才算让他出了口气。

进了初中的大弟,某天接受一项差遣,代表班级撰写一封什



孔雀图 (中国画) 万芾

想也看不到结果。眼前的赞誉大都短暂轻浅,最多算“掌声响起来”,我们需要掌声,就像我们面对大山呼喊,需要回声一样。写作也是一种表演,用文字表演,渴望观众的喝彩,很自然。但这绝非历史的评价,没那么重要,没那么严肃,千万别太当回事,这里含有太多即兴之感或文字以外的考量,就像飞机遭遇乱流,跟着乱流不知会飞到何处去。一百年,就一百年了,多了怕你绝望,少了怕你惦记,鼎公的一百年听似玩笑,但谁说不是他文学生涯的深刻感悟呢。

聊得火热,窗外斜阳渐渐深浓。怕鼎公劳累,大家遂举杯散去。走在熙攘街头,我仍琢磨着鼎公的百年之论。百年后我们早彻底寂寞,像路边这朵蒲公英,莫问归处。但只要有人华的漂泊,就一定还有海外华文写作,对根的追寻,对母语的沉醉,是不会枯竭的。如果那时还有这家小馆子,就还会有骚人墨客来此高谈阔论。肯定有人会坐在我们坐过的位子上,我知道的,但他们却看不见我们,就像此刻我们也看不见许多前辈们一样。

聊得火热,窗外斜阳渐渐深浓。怕鼎公劳累,大家遂举杯散去。走在熙攘街头,我仍琢磨着鼎公的百年之论。百年后我们早彻底寂寞,像路边这朵蒲公英,莫问归处。但只要有人华的漂泊,就一定还有海外华文写作,对根的追寻,对母语的沉醉,是不会枯竭的。如果那时还有这家小馆子,就还会有骚人墨客来此高谈阔论。肯定有人会坐在我们坐过的位子上,我知道的,但他们却看不见我们,就像此刻我们也看不见许多前辈们一样。

聊得火热,窗外斜阳渐渐深浓。怕鼎公劳累,大家遂举杯散去。走在熙攘街头,我仍琢磨着鼎公的百年之论。百年后我们早彻底寂寞,像路边这朵蒲公英,莫问归处。但只要有人华的漂泊,就一定还有海外华文写作,对根的追寻,对母语的沉醉,是不会枯竭的。如果那时还有这家小馆子,就还会有骚人墨客来此高谈阔论。肯定有人会坐在我们坐过的位子上,我知道的,但他们却看不见我们,就像此刻我们也看不见许多前辈们一样。

聊得火热,窗外斜阳渐渐深浓。怕鼎公劳累,大家遂举杯散去。走在熙攘街头,我仍琢磨着鼎公的百年之论。百年后我们早彻底寂寞,像路边这朵蒲公英,莫问归处。但只要有人华的漂泊,就一定还有海外华文写作,对根的追寻,对母语的沉醉,是不会枯竭的。如果那时还有这家小馆子,就还会有骚人墨客来此高谈阔论。肯定有人会坐在我们坐过的位子上,我知道的,但他们却看不见我们,就像此刻我们也看不见许多前辈们一样。

聊得火热,窗外斜阳渐渐深浓。怕鼎公劳累,大家遂举杯散去。走在熙攘街头,我仍琢磨着鼎公的百年之论。百年后我们早彻底寂寞,像路边这朵蒲公英,莫问归处。但只要有人华的漂泊,就一定还有海外华文写作,对根的追寻,对母语的沉醉,是不会枯竭的。如果那时还有这家小馆子,就还会有骚人墨客来此高谈阔论。肯定有人会坐在我们坐过的位子上,我知道的,但他们却看不见我们,就像此刻我们也看不见许多前辈们一样。

聊得火热,窗外斜阳渐渐深浓。怕鼎公劳累,大家遂举杯散去。走在熙攘街头,我仍琢磨着鼎公的百年之论。百年后我们早彻底寂寞,像路边这朵蒲公英,莫问归处。但只要有人华的漂泊,就一定还有海外华文写作,对根的追寻,对母语的沉醉,是不会枯竭的。如果那时还有这家小馆子,就还会有骚人墨客来此高谈阔论。肯定有人会坐在我们坐过的位子上,我知道的,但他们却看不见我们,就像此刻我们也看不见许多前辈们一样。

么决心书。大弟为展示写作水平,决心书里用了很多豪言壮语,那天他把写好的决心书送到我面前想听几行好话,我刚看了几句就笑得不行,他把“炎黄子孙”写成了“阎王子孙”。

大弟说,我是听广播里好像这么说的,我也觉得奇怪,为啥要说我们是阎王子孙呢?我故意逗他说:人总有一死,死了不就

是叫见阎王吗?所以大家将来都是阎王的子孙。我的这番胡扯,当然最后被大人批了一顿,可是以后这个“阎王子孙”却成了小弟回击大弟的武器,偶尔大弟嘴巴痒了一句“寒内”,小弟就高喊一声:阎王子孙!

妈说,那时写了错别字,也晓得难为情的,现在怎么故意写错

夏东元教授走了,媒体上没有刊登“讣告”消息,是华东师大历史系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先生已经九五高龄,7月5日,在普陀区中心医院因病医治无效而与世长辞。他是我们上海学术界年事最高,成果最丰的老教授之一。

记得在他九十岁那年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精神很好,记忆清楚,还与我谈起要出版一本《“临渊斋”耕耘录》的读书笔记。我打开这本近40万字的笔记,粗翻一遍,觉得很难公开出版,虽然这是一本他读书心得的笔记,但是却也记录了“文革”期间发生在系里的许多“细节”,有的指名道姓,鲜为人知,当然我相信这是他的亲身经历,但是,我想出版社是没有胆量出版的。

不过,我当面没有扫他的兴。倒是对他的“临渊斋”很感兴趣,于是与他聊起“临渊斋”的来龙去脉。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喜欢为自己的书斋起一个雅号。夏先生本来对此不感兴趣。一是以学未高深,俨然以某某书斋自嘲不免有自列于学林之嫌;二是认为不必有个什么书斋名才算是学者。可是,“文革”前,他在进行科学研究、发表论文等学术活动中,对学术界的紧张气氛和自己切身处境,颇有些危殆感,那时,把百家争鸣的“百家”,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家,他就感到,这种以“不入于杨即入于墨”,不姓“无”即姓“资”的划分,搞学术研究太危险了。1964年,全国开展“四清”运动,华东师大作为南方大学试点的基地,历史系又是这个基地的实验区。夏先生是这个实验区的重点批判对象。经过这次“洗礼”,他的学术研究危险感更强了。于是,他想起了《诗经》里所说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做学问何尝不是如此。不久,他就决定以“临渊斋”作为自己的书斋名。“临渊”的含义总的说是学术研究应该有冒风险精神。

“学术之险”什么意思呢?夏先生说,学术与任何事物一样,是不断发展的。学术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来源于学者的不断创新。作为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和规律的历史学,当然也不例外。不创新,学术就不能前进,但“创新”就可能有风险。在夏先生看来,“创新”就要与持旧观念的“权威”说法有异,你要“立异”,“权威”者们就可能视你为“异端”,加以围攻,或指使“小子鸣鼓而攻之”,或者牵强附会地把你列入姓“资”的那一家。夏先生是研究洋务运动的,洋务运动是个敏感的课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密切,他有切身的体会。1957年,他写一篇《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论文,在学术界反响很大,在一次市里召开的所谓学术讨论会上,有人不指名地说这是“托派观点”。“托派观点”在当时是很吓人的。1962年,他发表了《李鸿章早期的洋务思想》,文中在批评李氏错误的同时,肯定李氏有着一定的御外侮思想,在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创办发展近代工商业和预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等方面有进步的一面。这下子可糟了,批判的文章从四面八方而来,有的指责他是因为“大卖国贼涂脂粉”。夏先生是一位正直的历史学家,每写一篇文章总是有些胆战心惊,一有什么运动到来就如“惊弓之鸟”,真是“如履薄冰”。

夏先生一生致力于洋务运动史的研究,他的研究独树一帜,自成体系,尤其对盛宣怀和郑观应的研究用力最勤,影响最大。有《盛宣怀传》及其“年谱长编”和《郑观应传》及其“年谱长编”问世。可以说,他的洋务运动研究是在与“左派”们的较量中逐步成熟起来的。他认为,党的十一大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政治清明,学术宽松,那样批来批去,斗来斗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临渊”还有另一层含义:每写一篇文章或每出版一本书,都要想到,科学性如何?学术价值如何?是锦上添花,还是画蛇添足?……都要有“临渊”之感。当然,这是另一种性质的“临渊”了。

别字呢!我对妈解释,这是网络上搞着玩玩的,实际意思大家也明白的。妈问,你觉得这样好吗?我当然是反对错别字的。前些年参与一个文学奖的评审工作,记得有篇送审作品,不满两千字,竟有六七个错别字,作者简介里,此君还是一个什么级的作协会员。这让我反感,我想有的或许是打字时电脑出的差错,但送交作品前连错别字都懒得纠正的人,他的文章会认真推敲吗?这些年,微信的普及,人们赶时间,看文取其音辨其义,错别字已是常态,对此我也见多不怪了。

妈又追问,错的对对的看,好好的字还存心写错,对错也不分了,那么照这样下去,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汉字文化,将来会变成啥样子呢?

唉,九十岁的母亲怀着千年忧呢!对此我也只能陪她叹息一声。

夏东元和他的“临渊斋”

施宣圆

夏东元教授走了,媒体上没有刊登“讣告”消息,是华东师大历史系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先生已经九五高龄,7月5日,在普陀区中心医院因病医治无效而与世长辞。他是我们上海学术界年事最高,成果最丰的老教授之一。

记得在他九十岁那年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精神很好,记忆清楚,还与我谈起要出版一本《“临渊斋”耕耘录》的读书笔记。我打开这本近40万字的笔记,粗翻一遍,觉得很难公开出版,虽然这是一本他读书心得的笔记,但是却也记录了“文革”期间发生在系里的许多“细节”,有的指名道姓,鲜为人知,当然我相信这是他的亲身经历,但是,我想出版社是没有胆量出版的。

不过,我当面没有扫他的兴。倒是对他的“临渊斋”很感兴趣,于是与他聊起“临渊斋”的来龙去脉。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喜欢为自己的书斋起一个雅号。夏先生本来对此不感兴趣。一是以学未高深,俨然以某某书斋自嘲不免有自列于学林之嫌;二是认为不必有个什么书斋名才算是学者。可是,“文革”前,他在进行科学研究、发表论文等学术活动中,对学术界的紧张气氛和自己切身处境,颇有些危殆感,那时,把百家争鸣的“百家”,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家,他就感到,这种以“不入于杨即入于墨”,不姓“无”即姓“资”的划分,搞学术研究太危险了。1964年,全国开展“四清”运动,华东师大作为南方大学试点的基地,历史系又是这个基地的实验区。夏先生是这个实验区的重点批判对象。经过这次“洗礼”,他的学术研究危险感更强了。于是,他想起了《诗经》里所说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做学问何尝不是如此。不久,他就决定以“临渊斋”作为自己的书斋名。“临渊”的含义总的说是学术研究应该有冒风险精神。

“学术之险”什么意思呢?夏先生说,学术与任何事物一样,是不断发展的。学术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来源于学者的不断创新。作为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和规律的历史学,当然也不例外。不创新,学术就不能前进,但“创新”就可能有风险。在夏先生看来,“创新”就要与持旧观念的“权威”说法有异,你要“立异”,“权威”者们就可能视你为“异端”,加以围攻,或指使“小子鸣鼓而攻之”,或者牵强附会地把你列入姓“资”的那一家。夏先生是研究洋务运动的,洋务运动是个敏感的课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密切,他有切身的体会。1957年,他写一篇《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论文,在学术界反响很大,在一次市里召开的所谓学术讨论会上,有人不指名地说这是“托派观点”。“托派观点”在当时是很吓人的。1962年,他发表了《李鸿章早期的洋务思想》,文中在批评李氏错误的同时,肯定李氏有着一定的御外侮思想,在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创办发展近代工商业和预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等方面有进步的一面。这下子可糟了,批判的文章从四面八方而来,有的指责他是因为“大卖国贼涂脂粉”。夏先生是一位正直的历史学家,每写一篇文章总是有些胆战心惊,一有什么运动到来就如“惊弓之鸟”,真是“如履薄冰”。

夏先生一生致力于洋务运动史的研究,他的研究独树一帜,自成体系,尤其对盛宣怀和郑观应的研究用力最勤,影响最大。有《盛宣怀传》及其“年谱长编”和《郑观应传》及其“年谱长编”问世。可以说,他的洋务运动研究是在与“左派”们的较量中逐步成熟起来的。他认为,党的十一大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政治清明,学术宽松,那样批来批去,斗来斗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临渊”还有另一层含义:每写一篇文章或每出版一本书,都要想到,科学性如何?学术价值如何?是锦上添花,还是画蛇添足?……都要有“临渊”之感。当然,这是另一种性质的“临渊”了。